

人工智能冲击下一译者角色转变及培养模式初探

张雪萍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昆明

【摘要】人工智能冲击影响下，译者的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而作为文学与非文学性文本的审校者角色逐渐彰显。同时，译者作为人类法规，伦理道德的制定者与遵循者，为维持人类几千年的道德秩序，针对人工智能的冲击，其角色逐渐转变为译文的审判者。作为一位合格的译文审判者其必须提升翻译批评能力，翻译批评能力又来源于对翻译理论的掌握以及翻译标准的学习。对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的划分有助于译者对人工智能译作作出准确的判断，提升译者人工智能译文的审核水平。而人工智能具有产出译文文本高效、量大的特点，也使译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计算综合运用能力。人工智能是多学科共同协作的成果，译者掌握基础通信知识有助于理解人工智能翻译过程。对于人工智能翻译过程及译者角色的转变分析可推断出，未来译员培养模式为‘监督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者’模式。

【关键词】人工智能；译者主体性；翻译批评；监督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者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21 日

【DOI】10.12208/j.ije.20250017

An analysis of transfer on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mode under the impact of AI

Xueping Zhang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With the diminishing subjective status of translators, their role as supervisors of both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texts is increasingly revealing its true nature, impacted by the rise of AI. To uphold the human ethics that have been cherished for millennia, humans, as both creators and guardians of social norms and ethics, will inevitably take on the mantle of overseeing translation work. As supervisors, enhancing translation criticism skills is paramount, which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andards. Hence, it is crucia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andards, as this will facilitate the enhancement of supervisory capabilities in translation work. Furthermore, AI's ability to produce translations efficiently and in large volumes poses new demands on translators. They must possess a heightened level of integrated computing skills and a solid foundation in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It is because AI is a product of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Considering these factors,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the model for cultivating translators will be a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supervisor' and 'computer synthesizer'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I;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Criticism; Supervisor; Computer Synthesizer

1 人工智能研究现状介绍

人工智能研究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更是破解人类编码、深刻地自我认知的探索过程。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也随着这一探索过程不断深化：从最初的计算智能（快速逻辑运算、海量存储能力），发展到感知智能（“听”“说”“看”“触”能力），再到更高级的认知智能（理解、诠释能力）阶段，数理逻辑推理、人工神经网络的构建、奖惩机制的行为仿生等分别将人工智能研究向前推进（王华树、谢亚，2023）^[1]。

总体来看，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可以主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风险，涵盖了个体、社会、国家、人类四个层面。另一类是特定场景中的风险（梁正，2024）^[2]。

中国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影响下翻译研究的问题与前景（胡开宝、李晓倩，2023）^[3]进行了说明，同时也对未来中国职业发展方向及应用人工智能在文献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姚亚芝，2024）^[4]，其中对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内涵、构建和挑战阐

释详细(刘明等, 2024)^[5]。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影响下, 翻译主体性以及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缺乏具体说明。

国外学者也研究了人工智能对于语言和社会关系的影响(Hohenstein Jess et al, 2024)^[6], 剖析了人工智能对人权和自由的作用(Vitalii M Pashkov et al, 2023)^[7], 以及人工智能对操作系统安全性方面的考验(Rajeevan Arunthavanathan et al, 2024)^[8]。外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挑战和难题, 但对于人工智能影响下翻译人才培养问题尚找到参考性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人工智能翻译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人工智能造成译者主体性缺失, 但是译者还可以在翻译批评领域对翻译作品进行总体把控。为了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状况, 未来译员的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需提升, 所以未来译员的培养模式为‘监督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者’模式。

2 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挑战

2.1 人工智能冲击人类伦理

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 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风险与挑战。人工智能对于传统职业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对于人类社会伦理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伦理是在描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套道理和社会规范, 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规范行为, 维护秩序(陆艳, 2024)^[9]。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大技术进步, 它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挑战着原有的伦理价值判断标准, 必然导致各种各样伦理问题的产生。信息技术时代, 翻译术语库、记忆库和语料库已经被业界广泛使用,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 术语库、记忆库和语料库获得了自适应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 尤其是算法的隐藏性、范在性和自适应等特征, 凸显了翻译自动化在智能化可能引发的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梁正, 2023)^[2], 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和伦理思考的重要出发点。

科技伦理学家总结出科技人员应该秉持的十二项伦理价值, 分别是: 诚实、审慎、公开性、自由、信用、教育、社会责任、合法、机会、相互尊重、效率与尊重主体(陆艳, 2024)^[9]。且从算法伦理、交互伦理, 生态伦理方面对伦理标准提出了要求, 只有遵循这些伦理原则, 人工智能的使用才能规范化; 科技才能为人类及人类社会所用。

2.2 人工智能带来信息安全风险

而对于专业用户特别是语言服务行业来讲, 使用自动翻译对安全级别特别高的文本进行翻译, 如果出现错误, 将给客户和最终的用户带来安全风险, 加之普遍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自动执行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可控; 或是将翻译数据保存在云端, 可能存在黑客攻击数据的安全问题(王华树、王鑫, 2021: 13)^[10]。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翻译资源的控制权不受限制, 国家语言信息安全会受到威胁(蓝红军, 2019)^[11]。防止信息安全风险问题发生的频率, 国家出台整治措施的力度需要强劲。

2.3 人工智能对行业市场的利弊

人工智能的出现给就业结构带来协同潜力(李颖, 2024)^[12], 促进新的产业形成,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改变就业结构, 推动产业升级, 促进城乡就业与区域就业协同发展。人工智能在淘汰旧有职业的同时也带来新职业, 新机遇和新发展。同时也需要加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劳动者权益、国家对人工智能新领域也需要加强监管。就个体而言, 人工智能为人们提供了创新创业机会, 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对于个体发展作用显而易见。

人工智能出现后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抢占市场份额。具体而言就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于就业结构存在替代效应、有极化现象(李颖, 2024)^[12]。人工智能的替代现象指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就业市场、影响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 改变劳务市场状况、加剧社会不平等。人工智能的极化现象表现在人工智能造成就业结构的‘两极化’和‘单极化’趋势。前一种趋势造成技术水平的分化, 高技能人才需求增加, 低技能需求也增加, 就业层次出现分割; 后一种趋势造成高低技能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在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效应分析中, 不同国家都存在受到人工智能效应影响的情况(金向鑫, 2024)^[13]。

人工智能是双刃剑, 一方面抢占了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又带来机遇与挑战。抓住机遇, 最大程度规避风险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劳动者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对于某些行业的冲击是不可逆甚至是毁灭性的, 这类行业在面对挑战时只有及时做好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在冲击中存活。结合行业特点与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综合考量, 顺应发展趋势, 在决策制定、经营理念方面作出调整才有助于恢复行业活力与竞争力。

3 人工智能冲击对于译者角色及能力转向的分析

3.1 翻译主体性缺失译者监督者角色提升

从翻译阶段划分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在理解和表达阶段的翻译不论是在速率还是在量上都明显优于人工翻译。这就造成了译者主体性的缺失。而人工智能在翻译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校核阶段存在明显短板。这个短板不是说人工智能没办法对文章加以润色,而是指人工智能在对自己译文与人类世界中几千年来形成的伦理习俗,规约逻辑、法款条例缺乏基本遵循。而人类作为逻辑习俗、规约逻辑、法律条款的制定者和遵循者,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必然成为人工智能译本的最终裁决者。从翻译角度上讲,这也决定了未来译者在主体性地位弱化的同时其作为译文监督者的角色将提升。

人工智能的发展冲击着人类主体性地位,但随着时代变迁创造出来的新词具有创造性、发展性、任意性等特点(韩蕊,2019)^[4],这其中涉及人文因素变量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所以译员在作为监督者的过程中要注意人文素养的培养,关注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从人文素养的角度看,译者又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人工智能还不具备人类情感、道德相关的主观功能(杨密芬、封踪,2021)^[5]。从这个角度看,译员对人工智能译作作品可以进行情感分析或情感补充。从人类情感、道德角度对人工智能译作进行主观角度的翻译批评,使译作更加贴切自然。

过去译者在大数据背景时代在专利翻译项目中,可以在专利术语、句子层面上、语篇语义层面上体现作者主体性变化(徐刚,2018)^[6],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译者完全不用参与到人工智能的翻译过程。人工智能在接受 prompt 之后便会自行运行产出译作结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也就丧失了,这种角色上的转变需要译者将重心放在对 prompt 词的准确把握上,对于 prompt 词提出得越精准,人工智能越能发挥优势,呈现的译作也就符合人们的预期。

译员监督者角色的实施是在人工智能翻译的整个过程,从 prompt 词的首先提出,到人工智能运行过程中 prompt 的修改,这个过程中需要译员参与的部分就是对于 prompt 词的把握。这个过程中仍需译员从翻译的视角对 prompt 词进行打磨,只有精心雕琢的 prompt 词才能被让人工智能作出精准的产出,所以译员在实施监督者角色时注意掌握 prompt 词的使用。

3.2 译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提出新要求

从翻译成本上来讲,技术进步带来产业巨变的同时,也让翻译成本有所下降。过去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翻译主要依赖人工。一位成熟的译者将一本译作完

整的推向世人,翻译时间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而人工智能在接收到翻译指令后,便会执行指令,一直到任务完成。从翻译时长上讲,人工智能翻译优于人工翻译。人工智能从翻译字句的速度上讲,已经量化翻译的时长,打破了过去对翻译行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王清然,2019)^[7]。对于非文学翻译来讲,特别是在商务交往中,人工智能翻译以其高效准确的特点将在商务常规翻译中比重增加。而译者作为审校者,海量的人工智能译文也要求译者具备更高的信息技术综合运用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文本编辑处理能力。在强调计算机能力的同时,为了避免译者完全沦为机器的奴隶,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应强调了人文素养的重要性(王均松等,2023)^[8]。

译者为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适应人工智能或大数据语言模型影响下的翻译工作,对于计算机知识的掌握也需向更高水平迈进。从人工智能的特点来看,人工智能具有大数据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语言能力和仿生能力(冯佳康、黄昊,2023)^[9],这也才侧面说明掌握人工智能的人才并不能只限于应用层面,对原理也需要加强思考。计算机基础原理、操作系统知识的学习也是必要的。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与文字的编辑处理,它在应用代码。爬虫技术获取关键信息的速度和效率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已经远远强于人类;而人工智能的最基础知识原理来源于计算机知识;掌握相应的计算机知识对于理解人工智能运行原理、查找人工智能存在的缺陷突破点、提升译者对人工智能翻译作品翻译批评水平作用巨大。

分析人工智能的通信过程,未来译者需具备相应的通信知识。信号处理技术被应用于各种智能系统和设备中,用于处理和分析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这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电子电路设计技术及电子元器件的使用为人工智能提供了硬件支持,同时还能优化智能设备和系统的功耗和性能指标(冯佳康、黄昊,2023)^[9]。人工智能并不是单一研究领域的成果,而是人类自然科学方面的巨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信息知识的传递上离不开通信知识的应用。掌握基础的通信知识对于译者理解人工智能运行原理,分析人工智能翻译过程、音频与文字切换模式作用凸显。

由以上多方面分析得出,未来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将承担的角色是监督者要具备的能力是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也就是‘监督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者’模式(图1),针对个人要求不同兼具计算机及通信原理基础知识为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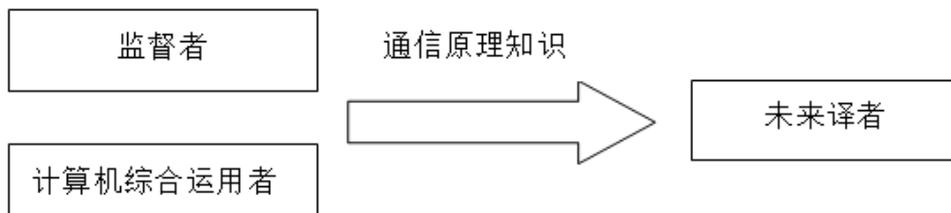


图1 未来译者培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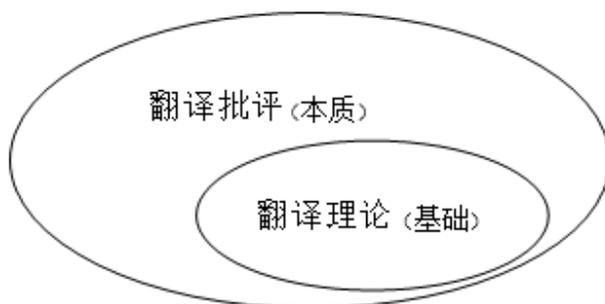


图2 翻译评价二维关系图

3.3 译者翻译批评能力培养作用凸显

(1) 翻译批评本质研究

细化监督者角色，在翻译中，翻译批评能力强化监督者角色，而要掌握翻译批评能力培养来源于对翻译理论的学习，对于翻译标准的掌握。论述翻译批评本质是一种评价活动，全盘套用译学理论，翻译批评极易同翻译之名而被人忽视其批评本质之异，导致评价让位于描写（认知）（冯丽霞，2022）^[20]。

翻译批评是应然和价值判断，翻译的界定会改变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改变人们对于意义的认识、改变翻译批评的模式、方法和标准；对翻译界定理解越多对于翻译批评的判断与应用也就越清晰。翻译批评是规定性的（廖七一，2016）^[21]，同时翻译批评的标准需要客观、历史的梳理观点与模式转变。把握翻译批评规定的特点，才能做到翻译批评的客观准确，真正发挥翻译批评的评价功能。

(2) 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是包含关系

翻译批评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保持其评价的本质。由此看出，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存在逻辑学意义上的包含关系（图2），即翻译批评需要翻译理论支撑又高于翻译理论。因此，译者要成为人工智能译本的监督者、裁决者，除了掌握扎实的翻译理论之外还需具备评价能力。否则无法跳脱出翻译理论的圈层，丧失翻译批评的本质，所进行的翻译批评也仅仅是评价让位于认知的思维活动（许均，2009）^[22]。

强化译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根因在于人工智能生成性的特点，产出译文数量大、效率高。译者若不借助相应的数据文本处理工具，仍采用传统翻译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承受人工智能译文带来的巨大工作量，身心都会遭受严重损害。YiCAT 在线翻译平台，De ja Vu 翻译软件和 SDL Trados 三款 CAT 工具都有审校功能（袁志恒，2022）^[23]，掌握如何使用审校功能能帮助审校人员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工具在减轻译员压力的同时也侧面要求译者强化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不仅是纯文本还有诸如记忆库、术语库等的学习掌握。

综上，未来翻译译员培养需要在翻译批评能力掌握方面有较高水准才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对于译者主体性缺失方面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译者只有积极转变角色，具备人文素养和高水平计算机运用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良好的翻译批评能力离不开对翻译理论扎实的掌握。

(3) 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标准异同分析

谈及翻译批评就需界定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区别。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标准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所以二者存在差异。翻译标准是针对内容本身而言翻译界已经达成共识，而翻译批评标准在译界仍未达成一致（周领顺、周怡珂，2020）^[24]，所以翻译批评标准的界定仍是需要发展的过程。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标准之间在定义、内涵意义、切入角度。呈现状态、用途方面存在差异（李玮，2020）^[25]。由于差异性的存

在所以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标准并不能混为一谈，而是需要界定。

由于翻译批评的过程就是翻译评估的过程，这个时候翻译标准可以用作翻译批评标准，两者的功能相同（李玮，2020）^[25]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翻译标准也就意味着掌握了翻译批评标准，而对于翻译标准的掌握来源于对翻译理论的学习。

（4）译者翻译批评素养要求

译者要具备评价他人作品的的能力，在具备扎实翻译理论的同时还需要有自己的翻译批评模式，其中忠实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在进行翻译批评的同时应全面、客观、科学地对作品进行评价，针对人工智能译作的翻译批评与传统人工译作的翻译批评要求基本一致。做好传统人工翻译的批评标准的构建有助于实现对人工智能翻译作品翻译批评水平的提高。对翻译批评标准进行多层次构建（王一多，2022）^[26]，让翻译批评系统化有助于提升翻译批评的客观性。

翻译批评从广义上讲是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从狭义上讲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既包括翻译对象、翻译文本的具体评价，也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价（许均，2009）^[22]。从狭义的角度看，翻译批评的掌握过程是一个总体的评价过程，对于翻译对象的把握，翻译文本的分析、翻译本质的透彻理解、翻译技巧的熟练应用，只有具备这些因素，译者才算有了基本的翻译批评能力。由此可见，翻译批评的培养应该贯穿译员学习的整个过程。翻译批评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纽带（袁丽梅，2022）^[27]，对于翻译理论的掌握是必要的，在翻译实践中运用翻译理论对于提升翻译批评能力，实现翻译批评功能作用显著。

译员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的背景下，除了具备翻译批评素养，还需具备数字素养。译员数字素养培养模式包含四个阶段：功能性获取阶段、技能学习阶段、实际操作阶段、身份特征（郑郁荻，2024）^[28]。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课程安排，对于课程内容的学习是对对应阶段课程能力的显性表现。四个阶段培养完成考核通过，译员也就具备了基础的数字素养。熟练应用翻译技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义感、持与时俱进的态度（杨密芬、封踪，2021）^[15]才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冲击下发挥译者应有的作用。

4 不足与未来展望

文章只是对于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译模式的思考，对翻译批评标准具体实施情况的案例分析不足。因此

未来还需增加对此类案例分析的解释。

5 结语

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一部分传统产业产生冲击。人工智能以其高效率、高产出的生成式模式对翻译行业造成冲击，特别是在非文学性文本翻译越来越趋近于人类的优异表现，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人工智能翻译。这造成译者丧失在非文学性文本翻译中的主体性。本文初步分析人工智能冲击下，人工智能对伦理道德提出的挑战、对译者主体性地位的影响，通过对人工智能整个翻译过程的参与度分析，发现未来译员的培养模式发生转变同时译者翻译批评能力需提升。一方面，面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需要认清形势。同时在人工智能冲击下，译者需接受主体性丧失的现实，译员的培养模式已转变为‘监督者+计算机综合运用者’模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固然会冲击到行业的发展，但是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仍需注意人文素养的作用。同时还需强调，针对翻译批评的能力培养离不开对翻译理论的扎实学习、对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区分，二者存在异同；一位合格的译者还需构建自身的翻译批评体系，增强自身翻译批评能力才能在对人工智能翻译作品进行翻译批评时做到客观准确。作者希望本文能为翻译学习者厘清时弊、坚定翻译学习的信心、在未来树立正确的翻译学习观，也希望本文能为未来翻译人才培养提供拙见。

参考文献

- [1] 王华树、谢亚,ChatGPT 时代翻译技术发展启示[J],外国语言教化,2023(7)(4):80-88.
- [2] 梁正,新兴技术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善治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J],2024(14):12-22.
- [3] 胡开宝、李晓倩,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翻译研究的发展: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23(6):63-74.
- [4] 姚亚芝,大语言模型在汉英技术文献翻译中的应用实证研究[J],翻译界,2024(2):8-24.
- [5] 刘明、吴忠明、杨箫、郭烁、廖剑,教育大语言模型的内涵、构建和挑战[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4(5):50-60.
- [6] Hohenstein Jess; Kizilcec Rene F.; DiFranzo Dominic; Aghajari Zhila; Mieczkowski Hannah; Levy Karen; Naaman Mor; Hancock Jeffrey; Jung Malte F.Springe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munication impacts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J],2023.

- [7] Vitalii M Pashkov;Andrii O Harkusha;Oleksii S Soloviov, THE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ON THE CURRENT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CONCEPT[J], PubMed,2023.
- [8] Rajeevan Arunthavanathan;Zaman Sajid;Faisal Khan;Efstratios Pistikopoulo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Human intelligence conflict and its impact on process system safety[J], Digital Chemical Engineering,2024.
- [9] 陆艳,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伦理构建[P],中国翻译,2024(1):117-125.
- [10] 王华树,王鑫.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技术研究:应用场景、现存问题与趋势展望[J].外国语文,2021,37(01):9-17.
- [11] 蓝红军.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J].上海翻译,2019,(04):8-13+94.
- [12] 李颖,多角度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冲击[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24(8):55-57.
- [13] 金向鑫,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及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2024(10):149-152.
- [14] 韩蕊,浅析人工智能背景下译者的不可替代性—以社会人文类文本为例[J],山西青年,2019(6):169.
- [15] 杨密芬、封踪,人工智能时代译员应具备的素养[J],海外英语,2021(1):214-215.
- [16] 徐刚,大数据背景下翻译项目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机翻技术应用于专利翻译为例[D],上海师范大学,2018:30-38.
- [17] 王清然,国际贸易、神经机翻译与语方服务企业绩效[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1-183.
- [18] 王均松、肖维青、崔启亮,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翻译模成嬗变、动因及启示[J],上海翻译,2023(4):14-19.
- [19] 冯佳康、黄昊,计算机通信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分析[J],数字通信世界,2023(10):110-112.
- [20] 冯丽霞,翻译批评本质辨析--翻译评价与翻译认知[J],外国语言文化,2022(6)(1):72-82.
- [21] 廖七一,翻译的重新界定与翻译批评[J],东方翻译,2016(4):11-13.
- [22] 许均,翻译概论(修订版)[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24-250.
- [23] 袁智恒,3款CAT工具在翻译和审校过程中的优势和局限[J],2022(25):校园英语翻译探究,2022(621):187-189.
- [24] 周领顺、周怡珂,翻译批评需要怎样的标准?—译者行为批评模式构建尝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5):107-120.
- [25] 李玮,翻译批评中的两个标准[J],作家天地,2020(3):28-29.
- [26] 王一多,翻译批评标准体系的多层级构建[J],外语研究,2022(3):81-86.
- [27] 袁丽梅,MTI学位论文写作中的翻译批评意识培养[J],中国外语,2022(4):85-90.
- [28] 郑郁荻,新文科背景下译员数字素养框架构建与培养模式探索[J],福建教育学报,2024(4):35-39.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